

需要哲学导论

赵科天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尚钧鹏
封面设计:张 明

需要哲学导论
赵科天 著

需要哲学导论

赵科天 著

ISBN 7-80608-254-9/B·2
(1996) G·W·C· 定价: 17.00 元

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

赵科天 著

需要哲学导论

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六年·兰州

省
民
主
主
义
文
学

序

前几天,赵科天同志送来了他的书稿——《需要哲学导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相识。寒暄之余,他要我为其书稿写序,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

此前数年,我们有文字之交,通讯之谊。他办《祁连学刊》,我主持《甘肃社会科学》,且兼管哲学栏目。科天同志,算是我刊老作者,也是骨干作者,所投稿件,都是经我手编发的。当初总的印象是,他的稿件选题的角度比较新颖,功力也比较扎实。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他在我刊发表的几篇文章,均有反响,社会效益不错,作为责任编辑的我,自然也觉得脸上有光,颇感欣慰。

去年底,他在我刊发表了《论需要范畴在哲学中的确立》一文。由于文章内容厚实,且论点颇新,我是作为重点文章、压轴之作安排在显要位置的,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篇文章发表后,果然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新华文摘》有辑目,《哲学动态》有反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哲学原理》卷,予以全文复印转载,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概是今年六月份左右吧,科天同志来信说,他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经过加工修改,汇编成册,书名曰:《需要哲学导论》,并准备送出版社付梓,以实现多年来的夙愿。我当即回信予以鼓励。作为哲学编辑,我深知“需要范畴”在哲学研究领域属前沿性课题。因为在我所了解掌握的学术动态中,还未曾接触到“需要范畴在哲学中的确立”这种观点和概念。

就在我 and 科天同志见面之后的七月份吧,我从《哲学动态》

1996年第6期的封三上,才看到有学者出版了《需要——创造论——人类观研究纲要》。就在同一报道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段话:“1996年2月16日的《中国改革报》载文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领域发生的最为重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事情,可能要算章韶华六部(作者注:《需要——创造论——人类观研究纲要》是其中之一)学术著作的出版了。它们一问世,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界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改革报》、《哲学动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级报、刊、台,都曾发表文章或报道,予以介绍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我在这里引用《哲学动态》上这一段话,主要是想说明科天同志所研究的课题,是个新课题,前沿课题,它将会给哲学范畴增加新鲜血液。

学术是严肃的,研究是无止境的。以科天同志的精神和毅力,他在学术领域的研究中,必然会硕果累累,更上一层楼的。

《需要哲学导论》即将出版之际,以自己孤陋寡闻的见识,写了上边的一些话,权充作序。

王步贵

1996年8月8日

于兰州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序.....	(1)
引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需要哲学的研究对象.....	(3)
三、需要哲学的基本框架.....	(7)
第一章 中国哲学史上对需要问题的探讨述略	(16)
一、《周易》的最初探讨.....	(16)
二、孟子“性善论”中的需要体系	(18)
三、荀子的恶性循环链	(22)
第二章 西方哲学史上对需要问题的探讨述略	(28)
一、需要概念第一次在古希腊哲学中出现	(28)

二、爱尔维修的“享受状态”	(31)
三、霍尔巴赫的“新的需要”	(35)
第三章 需要范畴在哲学中的确立	(40)
一、马克思以前需要在哲学中的地位	(40)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确立需要范畴的理论贡献	(42)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需要问题的基本结论	(50)
第四章 需要概念的重新界定	(57)
一、理论界的探讨和缺陷	(57)
二、需要的三层涵义及其实质	(62)
三、基本结论	(72)
第五章 需要的两种存在状态	(75)
一、提出两种状态的理论依据	(76)
二、两种状态的不同特征	(81)
三、两种状态的相互转化	(83)
第六章 需要的两种表现形式	(89)
一、一个亟待廓清的问题	(89)
二、“基本需要”和“新的需要”的共同特征	(95)
三、“基本需要”和“新的需要”的不同特征	(98)
第七章 需要的两种结构层次	(102)
一、高低层次及其局限性	(102)
二、内外层次及其依据	(104)
三、两种层次的不同结构	(109)
四、两种层次的不同趋势	(112)

第八章 需要层次的形成	(116)
一、需要的归属	(116)
二、需要层次形成的生理机制	(120)
三、需要层次形成的社会机制	(124)
第九章 “需要——满足”周期律	(131)
一、需要周期性的理论基础	(131)
二、需要周期性的表现形式	(135)
三、需要周期性的基本规律	(142)
第十章 需要与社会关系系统的层次结构	(149)
一、需要层次——划分社会关系层次的主要依据	(150)
二、心理关系——高低层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	(152)
三、内外层次——社会关系层次性的另一种情形	(155)
四、阶梯塔式层次结构——两种层次的契合	(156)
第十一章 需要在人的本质中的定位	(161)
一、人的本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状态	(162)
二、对“总和”的数理分析	(164)
三、“总和论”形成的理论渊源	(167)
四、“总和”是一个动态系统	(169)
第十二章 社会基本矛盾再认识	(173)
一、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	(174)
二、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	(176)
三、供需矛盾和其它矛盾的关系	(180)

四、将两对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原因·····	(184)
五、将供需矛盾作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在认识上仍不到位·····	(189)
第十三章 需要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生和推进·····	(194)
一、需要是社会基本矛盾诸要素生成的终极原因·····	(195)
二、需要是社会基本矛盾诸要素构成矛盾的主要根据·····	(199)
三、需要是社会基本矛盾周期性推进的根本动因·····	(209)
第十四章 需要与社会发展动力系统及运行机制·····	(215)
一、社会发展动力不是单一的力量，而是一个系统·····	(216)
二、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要素分析·····	(221)
三、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内部结构·····	(225)
四、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运行机制·····	(229)
后 记·····	(234)

引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 20 世纪后期至 21 世纪的跨越时期，在世界东方人口最多的古老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指导这场变革的，是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富于理性思维的民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自己创造的一个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既产生在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的背景下，又确立在对现阶段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但主要是后者。它是这个理论产生和确立的一大基石。

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什么呢？这个国家的人们坦率地承认，他们的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国社会仍处在复杂矛盾之中。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这个国家内部目前正在实行着的社会制度内部的基本矛盾。不过，这一矛盾在现阶段的中国又集中表现在生产力落后这一特点上。这就使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现阶段的中国具体化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着的物质精神需要之间的矛盾，并构成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也是中国目前国情的主要标志。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现阶段中国内部矛盾规律的研究有一种倾向,在主要矛盾的研究中,对矛盾双方的生产力一方的研究比较重视,但对矛盾的另一方——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需要——的研究不够重视。这是不科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是对立着的双方之间固有的一种既相互依存、联结、渗透,又相互对立、否定、违背的趋势。矛盾就是关系,是彼此之间的事,失去一方,另一方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它们彼此之间只有在对方这个参照系中才能得到说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这个意思。

研究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发展解决的规律,就要研究构成这一矛盾双方的每一方,即在着力研究中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解放和发展的内在机制的同时,还要研究现阶段人民群众的需要这一矛盾的另一方。作为一对矛盾,中国生产力与现阶段人的需要之间是须臾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生产力只有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才能找到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人的需要也只有从生产力这一方才能得到最终说明,并找到满足的最终途径。只有首先弄清这对矛盾双方各自的深层机制,才能最终弄清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解决的内在规律,也才能最终能动地把握中国现实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

以上只是一个特例。

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出发,逻辑地将我的思路引向了与出发点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我发现了至今还没有被哲学的视野所覆盖的一个新领域,这就是从哲学抽象的高度,用思辨的方法来全方位地探讨人的需要问题,因为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必然地要研

究现实中国人的需要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又迫使我不得不去考察人类需要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倒不如暂时丢开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先去研究另一个似乎是与我的出发点关系并不密切,但又委实不能分割的问题。需要哲学这个研究领域由此也就被开辟出来了。

该课题的主旨,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哲学范畴的高度来考察人类需要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得出关于需要的一些基本结论,为研究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成、发展、解决的内在规律提供基本的哲学理论依据。

二、需要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时代精神的结晶。通过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剖,发现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本身就是将此作为一个带有学科性质的课题的必要性所在。因为,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哲学探讨价值的重大问题,完全有必要作为一个学科性的课题对待,进行学科建设和研究,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考察需要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回避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和人学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人学和需要哲学的关系问题。

解决第一个问题,我首先遇到了当前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观点正经受着一次严峻的挑战。按传统的观点,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学说。世界之大,无所不包。世界上所有未知领域中的问题,

都在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在哲学的视野内，人的问题是一个必要而重要的审视对象。

但是，自本世纪以来，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以人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却在这一问题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 19 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战略转移为发展趋向，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论据，来探讨人的精神的趋向，要为精神寻找一个理想的家园。于是，在这里，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收敛性地集中到人和人的精神世界这个聚焦点上来。

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人类在哲学是什么的认识上出现两个极端并不是什么怪事，而是人类对思维进行再思维时出现的一种“二律背反”，是很正常的事。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哲学是什么认识上的这种“二律背反”，就不会有哲学的发展。它从人类精神世界的最高层面上证实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存在。

当哲学对象认识上的这种“二律背反”必然性地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中时，就相应地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极坚持原判，另一极则侧重于从人身上来寻找哲学的研究对象，说人是哲学的奥秘。

在我看来，不论是对哪一种观点，直接说其对还是不对，都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都是不可取的。既然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可以出现完全对立的观点，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又何尝不能出现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呢？既然没有矛盾和斗争，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那么没有在哲学是什么认识上的对立和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该问题的认识上就没有动力而言，就会在认识上僵化，就不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前一种观点，不可否定，因为它概括和总结了前人思维的最高

成果，奠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和基础，是真理性的东西。但后一种观点，也不能说其有什么不对。不要说哲学，即便是所有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哪一种不与人的问题有关呢？哪一种不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才形成科学的呢？现在已形成的所有学科中，我们非但找不出一一种是完全脱离人的问题的无病呻吟，而且常常为这些学科不能满足人的需要而苦恼。新的学科和新的方法的不断出现，就是在人们以科学对人的供不应求的焦虑状态下产生的。在自然科学中，数学是至今最完备、最严谨的科学，号称在其领域内的一切问题都是可解的，但数学又是与人的问题相隔较远的科学。如果我们直接说数学是研究人的学说，进而推出数学就是人学的结论来，显然是失当的。但研究数学的目的，并不是一种数字游戏，而是通过研究自然界的数量关系来掌握和控制运动规律，最终为人服务。因此，从最一般意义上说，所有学科最终都不能与人的问题脱离关系。探讨世界的问题，也就是在探讨人的问题。

由此可见，人类从探讨客观世界出发，终究会必然性地走向探讨人的世界；相反，从探讨人的问题出发，也将必然性地走向探讨客观世界。人本来就是客观世界中的存在，思维和存在本身就具有同一性，这一哲学中早已解决了且被奉为哲学最高问题的命题，在许多人的研究中却被悄悄地忘却了。

在我看来，哲学既要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又要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又必然性地要在对方中说明自己。没有对世界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理解；没有对人的理解，也不会有对世界的理解。哲学研究的对象既是人，又是世界，是人和世界的对立统一，或者说是一个最常见、最普遍的命题，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哲学对人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进一

步划分出人的需要来。自古以来,哲学的发展的确伴随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哲学对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如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和发展以及人的需要,等等。伴随着人的进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发现,关于人的问题虽然不断地在增加着新的内容,但哲学关于人的问题的一系列基本内容还是确定下来了。

在哲学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领域中,人的需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哲学研究的对象,既是世界哲学与人的哲学的高度融合,又是它们二者的高度背离,其中人的问题是这种背离的一极。站在这一极看问题,所有学科的确无一不是在研究人学,只不过有些具有直接性,有些则具间接性,是通过其它环节来研究人的问题。这样,我发现,各种学科实质上是从不同层面上研究人学的,通常所说的在哲学层面上的人的本质、价值、需要、解放、发展等,可视为第一个层次;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生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直接研究人的具体科学处在第二个层面;其它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处第三个层面;依此类推,自然科学则处在最外的层次上。哲学对人的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从外圈到中心一层层取得的,从外到内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从内到外是一个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仅构成了哲学关于人的问题的学科阵容,而且形成了哲学取得关于人的认识的基本途径。

为什么关于人的问题会形成哲学对象之一极呢?这是因为,较之于世界的本源,人的问题是唯一具有同等探讨价值的问题。在人们目前所发现、所提出的各类问题中,只有人的问题才能与世界的本源相提并论。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人和世界一样,本身也是一

种发展中的存在,不会形成一成不变的模式。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形不成一种公认的定论的原因也在于此。要在变易中捕捉那既是现在又是对现在的超越的定在,谈何容易。人之所以成为发展中的存在,只能归结到人的需要上来,需要使人趋利避害,使人劳动,使人向往自由,使人结成社会关系。一句话,需要使人成其为人,因为需要中包含着矛盾,包含着对现实的超越,包含着向前发展的原始动因。

由此可见,在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开辟出研究需要问题的一块阵地的意义和价值了。它将和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人的思维的研究、人的价值的研究、人的潜意识的研究以及人的自由、解放、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一起,在构成人的哲学的基本框架的同时,也在人学的大观园中增添一枝独秀的奇葩,最终也在哲学的研究对象中增添生机和活力。

三、需要哲学的基本框架

将人的需要作为哲学的一门新的学科来对待,就要解决它应该研究些什么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它的基本框架的构建问题,或叫做研究内容。这是对需要进行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人的需要大有研究的价值,特别是从哲学思辨的高度进行把握,更为必要。事实上,不论我们从哲学史的角度着眼,还是从哲学原理的角度着眼,从古到今,在人类思考哲学的其它问题的同时,已经为需要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疑问。面对这些疑问,各门具体学科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科学性的研究和考察,给出过各种各样的不同回答。这些回答,在具体地、局部地解决了这一领域内的

某一问题的同时,也更进一步地提出了问题,要求从总体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给以回答,这就为哲学对此问题研究准备了材料,开辟了领域。

纵观古今人们对需要提出的问题和自己的反思,将需要作为学科对待时,目前迫切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从而构成了它的基本框架。

1. 对需要的历史考察及概念引入

将需要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来对待,首先面临的的就是对其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进行全方位考察,以便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它的资料,为进一步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扫清道路和奠定基础。于是,我们就有责任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领域内进行考察,在哲学史上,人们对其有什么看法,形成过什么理论,从而了解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发源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需要范畴来。这样,我发现了这一课题的第一群子课题,它们是:中国哲学史上对需要问题的探讨;西方哲学史上对需要问题的探讨;作为范畴,需要在哲学中的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对需要概念究竟应该怎样界定;需要是怎样发生的,等等。对这些子课题的探讨和研究,就形成了该课题的第一部分。

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中国哲学史上,研究需要问题的最早的文字资料可追溯到《周易》,并且它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研究该问题的最早资料。《周易》之后,在中国哲学史上,人们大量探讨过这一问题,只是由于文字上的原因,没有直接使用“需要”这个词语,而是多用“欲望”这个词语。不论用什么形式,其涵义是需要,而且对该问题的论述和思想是很丰富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论述需要的思想也很丰富。在古希腊哲学中,这一概念就在伊壁鸠鲁哲学中出现了。后来在18世纪法国哲学中,对此的论述比较集中,爱尔维修用它来说明“享受状态”,霍尔巴赫则首先提到了“新的需要”的概念,为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将其作为辩证法的材料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哲学史上,对需要问题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需要范畴在哲学中的确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较之于其他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论述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是对此概念使用的频率和次数是空前的,由此使其在哲学中的地位“升格”;其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人类对需要概念的使用走向了自觉化;其三,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这一问题放在辩证法中来审视,从而把这一问题真正“提升”为哲学问题;其四,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引入这一问题研究,从而第一次将需要问题安置在它的真正位置上。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需要产生的理论、关于需要类型的理论、关于需要属性的理论、关于需要满足条件的理论和需要满足目的理论,等等。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奠定的坚实基础,这一概念在哲学中的范畴地位才被确立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将它作为一个学科性的课题做深入的研究。

尽管需要已被作为哲学范畴来对待,但其概念仍要重新界定。这是因为,从《周易》和古希腊以来,到近代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确立了它的范畴地位,但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地考察其深层意蕴。人们对其所下的定义都无一例外地在外在性上打转

转,并没有看到其内在机制,因而也没有揭示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就要对其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2. 需要的存在、表现及其满足

当我对需要做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考察及概念界定之后,这就意味着在我所开辟的研究阵地上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扫清了障碍,进而,就要沿着已经确定的方向,运用已经选择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其内在机制和规律,这样做的结果,把我的思路带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领域,引导我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诸如,既然需要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与生存问题不可分割,那么它在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是如何存在的,既然需要内在地存在于人的世界的各个领域,那么它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外在的表现出来,既然需要与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层次关系,并且是内部层次性的外化,那么它的这种内部层次是什么,既然需要与满足具有天然的联系,那么它又是如何被满足的,这种满足又意味着什么,等等。于是,我又发现了这一课题的第二群子课题,它们是:需要的存在状态、需要的表现形式、需要的结构层次及其形成、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及其基本规律,等等。

关于需要的存在问题,我认为,它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潜在状态,一种是现实状态。潜在状态是还没有被主体所意识的那部分需要,在反映中属于潜意识部分,现实状态是已被主体意识的那部分需要,在反映中属于显意识的部分;潜在状态有自在性、隐蔽性、可能性三个主要特征,现实状态有自为性、显现性、现实性三个主要特征。需要的两种存在状态是联系着的整体,其联系主要表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在一定条件下,潜在状态可转化为现实

状态,现实状态也可转化为潜在状态。

关于需要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基本需要”和“新的需要”两种途径表现出来的。人们通常用静态的方法对需要进行分类,不足以刻画它的活动和表现。用动态的观点观察问题,它只有两大类:一类是人类既得的需要,另一类是正在出现的需要;前者可称为“基本需要”,后者可称为“新的需要”。“基本需要”和“新的需要”虽有明确的界限,但无天然的鸿沟,它们之间是对立面的统一,各自只有在对方中才能表现出来。

关于需要的结构层次,已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也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层次论,但这些层次结构都无一例外的是以单一的社会价值为标准而设计的,忽视人的个人价值。我将其称之为需要的高低层次结构,它不是需要层次性的全部内容。需要层次,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价值立体结构,既根据社会价值排成次序,又根据个人价值排成次序;前者排成高低层次,后者排成内外层次;两种层次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契合,共同构成需要的层次结构,统一在人的需要体系之中。

需要层次的形成,有其生理和社会两个方面的成因。从生理上说,它的形成是人的内部身心组织和周围环境的物质依赖关系通过人脑的自组织功能产生的一种整合反映,这种反映最突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刺激。当我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心理学对刺激的研究成果时,便惊奇地发现,作用在大脑皮层的刺激与需要层次是何等的一致,以致于使我无法摆脱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普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特别是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系统在刺激作用下产生的系统性活动的研究更提供了这方面有力的证据。

唯物主义史观都指引我，首先去考察社会生活的层次性。于是，我第二次惊奇地发现，人们观念中的需要层次，与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生活的层次性又是何等的一致，使我不得不得出需要层次是社会生活层次性的内化的结论来。因为社会生活的根源并不在别处，而恰恰在于人的需要。它是任何一个社会兴旺发达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因，由此才引起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发生，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反过来，正是由于由需要引起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创造性，又强化了这种原始动因，使社会发展动力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作为社会发展动因持所有者的人，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并不能袖手旁观，自然规律注定他必然地投身到这种过程中，并处于主体地位。在参与、驾驭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经过外界条件的影响与内在自我所“制做”出来的内在身心组织，必然以符合社会期待的外显形象表现出来，这就是需要层次。

需要一旦产生，就有个满足的问题。人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被满足的？它们之间有何必然的联系？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般人可能以为有点吹毛求疵，我却感到其中奥妙无穷。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大概是我们每个人和由他们构成的这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最基本的内容了。试想，如果从我们生活中抽掉这一内容，剩下的将是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将是人性和社会的“真空”。因此，需要和它的满足，是人和人的社会的最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需要产生于它的满足，满足产生于需要，起决定作用的是需要，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说，需要的产生有三个方

面的根源，即生理的和社会的、先天的和后天的、既得的和再生的根源。每个方面的根源又是一种“二律背反”，不论纯粹从生理、先天和既得性上看，还是纯粹从社会、后天和再生性上看，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需要的产生和满足都只能从对方中寻找，任何期待在某一方面有纯粹的根源的设想都是徒劳的。所以，需要的产生和满足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周期律。

需要满足的周期性是通过一个“大循环”、一个“小循环”和一个“内部循环”三种形式实现的，呈现出递进律、推挽律、上升律、放大律四个基本规律。这就是说，人的需要在周期性地推进过程中，并不是“驴推磨”式的原地转圈，而是递进的、上升的、放大的，集中到一点，就是遵循着发展的规律。这是受宇宙普遍存在的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支配的。在这一规律支配下，从需要到满足，完成了第一次否定；但满足是暂时的，新的需要已经在其中脱颖而出，于是又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由新的需要否定了满足状态，回到了需要的本来状态，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3. 需要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需要在人的哲学中是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由人来构成的这个社会，必然与人的需要摆脱不了种种联系。需要与社会有什么联系呢？这就是这一课题基本框架的又一个构成方面。

将人的需要一旦放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考察时，我发现，它与该领域中的许多重大范畴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需要与社会关系、需要与人的本质、需要与社会基本矛盾、需要与社会发展动力，等等。而且，一旦将需要的理论运用在这一领域时，我

看到,需要是说明社会历史领域内许多重大问题的必要条件。由于我们过去很不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导致传统教科书在阐述许多重大问题时留有许多疏漏。运用我已经得到的结论,对这一领域中许多悬而未决或争论不休的问题都会有新的理解和解释。

运用需要层次理论,我发现人的社会关系内部也存在着结构层次,因而得出社会关系是一个层次结构系统的结论,这对于理解伴随人类思想史始终的争论焦点——人的本质——有极大的帮助;运用需要发生的原理,我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发生问题,从而矫正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固有属性说”的生硬解释,证明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到消亡过程的真理,即便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运用需要系统的基本原理,我对社会发展动力系统进行了要素分析和内部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探讨,从而证明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界运动物体一样,有一个动力系统在起作用,而且该系统是由若干要素构成、并通过一系列环节构成的传动装置,这就不仅改变了传统教科书关于这一问题的生硬说教,而且填补了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运行机制问题上的空白。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其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对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的理解上,我的观点和传统教科书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出入。我认为,正如阶级和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们在历史上产生,又必然要在历史上消亡,因而不能说它们是社会基本矛盾,更不能说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真正的社会基本矛盾应该是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因为较之于前两对矛盾,这一对矛盾更

永久,说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更确切,不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时,只要人的需要不终止,生产就不能终止,二者的矛盾关系也就永远不能解除。

第一章

中国哲学史上对需要问题的探讨述略^{*}

作为重要的哲学问题,人类对需要的认识和探讨是伴随着人类思想史进行的。从中国古代哲学源头的《周易》中有了这个意思后,人类对它的认识和探讨历经苍桑,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那么,人类是怎样认识它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对需要进行基础理论建设时必须研究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周易》的最初探讨

据我考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到需要问题的文字资料,当推中国文化和哲学源头的《周易》。因为《周易》的成书时间目前说法不一,所以人类对需要问题探索的最初时限,也只能以推算而已。如果从西周算起,《周易》成书至今至少 3000 年,人类对需要

^{*} 本章以单篇文章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5 年第 9 期辑目。

第一章 中国哲学史上对需要问题的探讨述略

的认识和探讨也至少有 3000 年的历史了。

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周易》中集中论述需要问题的是《需》卦:

《需(䷄)》:《象》解作“须”,为等待之意。《序卦传》解作“饮食之道”,为需之意。细考“需”之本意,应为雨可濡须之意。《说文》以为“须也,遇雨而不进止须也”。由于人们的行为可以引申为“须也遇雨不进”,是人们对雨的一种反应,又因为雨水可以滋润草木百果,又可以有沾濡,进而理解为“饮食之道”,是雨水的可能效果。从卦象看,“云上于天”就是雨水尚待下施之意。因此既有“须”意,又有“濡”意。将词义与卦义合解,“需(䷄)”就可理解为尚未施赐的膏泽。……《需·大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是由雨之润物引申到食之润身,因此也就将“需”义定为“需要”。^①

如果这种解释能够成立,则《需》卦就成了人类对需要问题的最初探索。其涵义包含“两层意思:须待——此时物我之分,等待相合;沾濡——此时物我相合,我身被泽滋润。须待是一个过程,沾濡却是目的,是对他物的占有。”^②

需要的这种物我之分是怎样得到合一的呢?

《需》综卦为《讼》(䷅),“讼”即争的意思。由《需》之象看,“讼”就是百果草木为了得到雨露沾濡而进行的竞争。从《需》之象看,“讼”又是相违背,是矛盾冲突。因此,

“讼”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而进行的竞争。……需要不仅引起竞争,也带来协同。《讼》上《乾》下《坎》,若辑《坎》为《离》,就成《䷵》为《同人》,“同人”就是求同于人。^⑤

根据这个资料,《周易》就已对需要进行过探讨,并将此作为全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过一系列重要思想。概括起来,《周易》对需要的理解包含三层意思:

- (1) 它是对物质的追求;
- (2) 竞争是满足需要的基本手段;
- (3) 需要离不开协同。

在这里,我们发现,《周易》对需要概念的理解已经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除含有现代人理解的部分外,还有一个独到的地方,这就是,需要不仅是单向索取,而且是一个协同的过程,因而是双向的。

二、孟子“性善论”中的需要体系

《周易》之后,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凡有建树的思想家无不涉及过人性问题,因而不得不谈论需要问题,其中集中对此问题展开论述的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和荀子各执一端,分别从“善”和“恶”的两个极点对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因而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思想可以作为继《周易》之后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人学理论的代表。

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系统论述人性问题的哲学家,“性善论”是他人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性善论”为基础的人学

理论中,孟子对需要问题的探讨和论述是非常丰富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过需要这个概念,但他对人的欲望的论述却自成体系。他说: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①

端是萌芽,“四端”与生俱来,就象人生来就有四肢一样,是人的生命的重要组成成份。如果将“四端”概括起来,就变成“仁”“义”“礼”“智”“四德”。显然,孟子是主张人的精神生活为主的。在他看来,这“四端”及“四德”不仅是人与生俱来的需要,而且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

无惻隱之心,非人也;无羞惡之心,非人也;无辭讓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②

为了证明精神性需要对人一生的重大意义,孟子还与告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告子主张“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反对这种提法,认为如果把食色之欲看作是人的本性,那么人的本性岂不跟动物的本性相同了吗?所以他反问:“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孟子看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性和道德,人有精神需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孟子虽然主张以仁义道德为主的精神需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但也并不主张完全弋尽人的生理欲望,只是在生理需要与精神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才主张“舍生取义”。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⁶⁾

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身而取义”,这是“孔孟之道”在严重动机冲突下的选择。在孟子的需要体系中,“道”为最高层次: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⁷⁾

那么,如何满足“道”这种高层次的需要呢?孟子曰“养浩然之气”: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谨于心,则馁矣。⁽⁸⁾

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人的精神气质、气节。这种气与道义相配合,是伟大而坚强的,它充塞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缺乏

它,就没有力量。它是靠不断地道德修养而产生的,并不是靠突击所能得到的,只要做一件与心有愧的事,它就会遭到破坏。为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孟子主张排除外界干扰,进行自我反省: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⁹⁾

具有“浩然之气”的精神气节,就是没有富贵,也可以抵挡得上富贵:

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¹⁰⁾

为了完善高尚的人格,孟子要求人们尽量减少物质欲望,强调“寡欲”,实际则是如何处理低层次需要和高层次需要的关系问题。他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道”“义”放在第一位,重道义而轻物欲。这是孟子思想中对需要含义理解上的特殊之处。

有人曾经做过概括,认为孟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需要概念,使用的是“欲望”这个词语,但孟子的论述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需要体系,并以个体需要为基础。在孟子那里,人的需要包括:第一,饮食、男女的自然生理需要;第二,人际交往的需要;第三,追求真善美精神生活的需要。⁽¹¹⁾